

绪 论

一、中国的贫困人口

贫困问题是世界上著名的‘三 P’问题之一。不仅存在由于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相对贫困，而且也存在着缺乏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绝对贫困。这里所说的绝对贫困是就那些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而言的。他们食不果腹、缺衣少穿、居难避风雨、收入低、寿命短，是人类社会中生活最艰苦的那一部分人。这种绝对贫困人口在旧中国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60%—70%。新中国建立后情况好多了，人们安居乐业、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到 1978 年仍有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 31% 的约 2.5 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贫困人口急剧减少，到 1984 年只剩下 1.25 亿人。在这个时期（1978—1984 年）平均每年有 1785 万人脱贫，这个速度在旧中国不待说了，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中也是没有的，在世界上更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1985 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全国的扶贫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扶贫工作的进展。1985—1992 年这七年中又有 4500 万贫困人口脱贫，他们的年人均纯收入从不足 200 元人民币提高到 450 元以上，人均粮食从不足 300 公斤提高到 350 公斤以上。这样，到 1993 年全国还有 8000 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约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 9.3%，主要集中在 592 个贫困县中。就分布来说，主要在东部的沂蒙山区、闽西南、闽东北地区；中部的努鲁儿虎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大别山

区、井冈山区和赣南地区 西部的定西干旱地区、西海固地区、陕北地区、西藏地区、滇东南地区、横断山区、九万大山地区、乌蒙山区、桂西北地区等。其地貌特征有的是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干旱区 有的是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地方病高发区和水库库区。就贫困程度来说,1992年这些县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 60.5 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人均财政收入 338.9 元的 17% 其中有 37 个极贫县人均财政收入在 20 元以下,全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撑;人均占有粮食在 300 公斤以下的缺粮县很多,仅国家重点扶持的 331 个贫困县中就有 138 个 人均粮食低于 200 公斤的还有 73 个。1992 年全国贫困县共吃返销粮 65 亿公斤 除其他用粮外 人均吃返销粮 54.3 公斤,每人每年缺三个月的口粮;吃水也十分困难,全国约有 8000 万人口、6000 多万头大牲畜常年饮水困难,一般缺水都在半年以上;路也难行,1992 年还有约占全国总乡数 3.52% 的 1700 个乡不通公路,有约占行政村总数 20.97% 的 16.6 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还有约占全国总乡数 3% 的 1400 个乡不通电,占总乡数 1.2% 的 560 个乡不通邮,信息十分闭塞;库区移民为全国和下游地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 1500 万库区移民中还有 950 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其中 104 万人生产条件极差,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在贫困县中 由于自然条件太差 还有 500 万人口处于一方水土难于养活一方人的恶劣环境之中;贫困县的医疗卫生条件也差,约有占乡镇总数 4.4% 的 2123 个乡没有卫生院,人口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都比较高,仅就 10 万人孕产妇死亡率来说,贫困县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多,是北京和上海的 10 倍多 受教育程度也低 在全国贫困县中 有 121 个县 7—11 岁儿童入学率在 90% 以下,平均每个县约有 7000 名适龄儿童由于贫困而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平均每个县教师缺编高达 360 人之多,基础教育甚至义务教育都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还未脱贫的这 8000 万人口,他们生存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其低下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脱贫的艰巨性。然而,他们所处

的时代、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今后发展趋势等各方面条件决定了他们又必须尽快地脱贫，走出绝对贫困的泥潭，同全国人民一起在 2000 年过上小康生活。这既是贫困地区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我国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著名的“三步走”规划中的第二步棋；既是我国进入 21 世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起码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解决妨碍贫困县发展的各种问题，包括科技问题、人口问题和教育问题等。

二、人口因素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

我国现在仍处于贫困状态的 592 个县的贫困渊源是十分久远的，上溯到何年何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 1985 年前后都没有走出贫困，这是我们十分清楚的。他们陷入贫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有资源短缺的，也有人口过多的，有经济底子薄弱的，也有人的素质低下的。但是，在他们导致贫困的许多原因中，人口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响面既宽又广，时间持续也相当长。在今后脱贫致富的奋斗中，调节人口状态，提高人口素质也将起着特别突出的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在致贫和致富运行机理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分母作用巨大而久远。一个地区的贫富程度只看总量水平是不够的，还必须看人均水平，后者才是测量贫富程度过硬的、实在的尺子，而人口的多少，增长速度的快慢，在人均水平的各项指标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贫困县的特点是，人口相对生产要素显得过多，人口增长较快，这正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比分析中我们发现，具有相同社会财富存量和增量的两个不同的县，只因人口总量和新增人口数量不同就会导致人均水平的极大差异。在这里，降低出生率、减少新增人口就将直接为贫困县提高各项人均指标作出重要贡献，否则，巨大的社会财富增量也会被增长迅速的人口拉平，甚至使人均水平降低，人们只能在贫困深渊中挣扎而不

能自拔。所以，人口数量过多的致贫因素及其分母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2. 不可小瞧分母对分子的反作用。这里分母是指人口及其增长速度，分子是指各项经济指标。如果一个地区（例如一个贫困县）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好，生育率较低，新增人口较少，就会节省一大笔新增人口投资，同时也节省了部分夫妇本应用于抚养孩子的宝贵时间，二者通过多种渠道转化成加速经济发展的因素，加大投资，增多劳动时间，必然提高作为分子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相对减少新增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缩小了分母，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分子，也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否则，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好，生育率较高，新增人口较多，既增大了分母，又缩小了分子，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积累基金也只能用作新增人口的消费基金，降低了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贫困县新增人口的过快增长是他们长期以来没能脱贫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增人口过快增长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从扩大分母和缩小分子两个方面降低人均水平，对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工作极为不利。

3. 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人口素质较低是贫困县的特征，文盲率高，教育层次低，科技人员少，思想陈旧保守的人多。低素质的人口必然使科技知识存量少，缺乏革新意识和开创精神，劳动生产率低，提供的剩余产品少，每个劳动力为分子各项经济指标增长的贡献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不利于尽快脱贫致富。低素质的人口对经济发展也起着双重的制约作用，既不能促使分子各项经济指标的迅速增大，又会促使人们多生多育，加大分母的存量，降低各项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贫困县要想摆脱贫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把真功夫和心思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只要认真抓了这项工作并能坚持下去就会获得人口素质提高的双重效果，分子迅速增大，分母相对缩小，人均各项经济指标就会很快提高。

4. 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很大的制约作用。人口产业

结构、人口职业结构、人口技术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地域结构、人口文化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都处于较优状态时，就会推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较快地增加分子各项经济指标的总量。反之，人口产业结构单一，人口职业结构是体力主导型，人口技术结构层次低，人口城乡结构失衡，人口地域结构畸型，人口文化结构落后，人口社会结构缺乏活力，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那么这些人口结构作用的结果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减缓分子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量，又刺激人们多生多育，增多分母存量，使人均各项经济指标难于提高。贫困县致贫的原因之一，就是贫困县的人口结构存在着严重问题，不下大力气调整现存的人口结构，使其逐步趋向合理化，贫困县就无法走上富裕之路。

5. 人口相对过剩的负效应，增加了人们摆脱贫困的艰巨性。一个地区人口数量过多，使一部分人成为与社会能提供的劳动就业岗位比较而言的多余人口。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贫困县的共同特征。它的存在使社会造成双重浪费，既是劳动资源的浪费，又是消费基金的浪费；同时又堵截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就测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说，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既阻碍分子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又加大了分母的数量，使人均水平随其增加而逐步下降，增大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难度。相对过剩人口引起的负面效应是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脱贫致富是不可能的。

6. 贫困县的自然条件本来就比较恶劣，由于人口过速增加，致使贫困地区的人口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这是贫困县难于脱贫的重要因素。在许多贫困县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到处毁林开荒，坡田超过 45%。仍在耕种，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日渐沙化，施用化肥过量，土壤贫瘠板结，涵养水层减少，下雨洪灾，无雨旱灾，河床日高，流断水少，人畜缺水，风沙飞扬，结果是人均产量下降，为了生存不得不再去开荒，造成恶性循环；乡镇企业刚有发展，由于技术低、资金少，只能拼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

和浪费 乡镇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横行乡里 严重污染了环境，威胁着人的健康和动植物的生存。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逼着人们走进了死胡同，越走下去越无法摆脱贫困，而只能在人们贫穷、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恶性循环中辗转挣扎。这种情况告诉我们 此路不通 必须改弦更张 另辟蹊径 走出死胡同 按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既考虑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二者兼顾。只有如此 并长期坚持 才可能使贫困县获得脱贫致富的一线希望。

综上所述，人口问题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的作用层面是多重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处理得好与不好对脱贫致富的实际进程关系极大，因此，为了早日告别贫困走向富裕，对人口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多方设法加以解决。

三、人口问题只有在消除贫困的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就人口问题来解决人口问题是没有出路的，也是解决不了的。人口问题的消除要在发展中实现。贫困县的人口问题十分突出是与经济的不发展联在一起的。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脱贫致富，既是解决贫困县众多社会问题的基础，也是解决贫困县人口问题的基础。没有经济的长足进步和发展，企盼消除人口问题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许多致贫因素的解决，其中特别是人口问题的解决。

那种夸大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说人口状况能决定贫困地区的致贫或致富，当然是不对的；而另一种漠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人口问题于脱贫致富是无足轻重的，也是不对的。我们既不能夸大也不能低估人口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人们脱贫致富实践中所起的重要的影响作用。人口问题可以同其他致贫因素一起阻碍经济的发展，拖住人们脱贫致富的后腿，也可以抵

销某些其他致贫因素的作用，而促使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更可以同其他有利经济发展的因素一起促进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加速人们脱贫致富的进程。关键在于人口态势与经济发展要求的背向。人口因素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减轻诸多其他致贫因素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人口问题的初步解决更会变阻力为助力，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较快地富裕起来。许多贫困县把抓人口问题的解决作为经济起飞的突破口，用治理人口的办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符合人口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而另一些尚未脱贫的贫困县之所以仍在被严重的人口问题干扰着，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协调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不懂得按着人口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规律办事。我们“中国 23 个贫困县人口问题研究”课题的直接目的就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贫困县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提高人们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和自觉性，逐步把人口问题从贫困县经济发展的阻力变为助力，推动、加速人们脱贫致富进程。在 2000 年同全国人民一道过上小康的生活。这正是我们编辑和出版《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一书的宗旨所在。

四、动员一切力量，为消除贫困而斗争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的迫切问题。“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为了消除贫困，中国政府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使尚未脱贫的 8000 万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实现温饱。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纯收入达到 500 元以上，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农田，户均拥有一亩林果（经济作物）园，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户均建成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 63—64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一项养殖业或其他家庭副业，牧区户均有一个围栏草场；使绝大多数贫困乡通电、通邮、通公路 大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普及初等教育，努力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使贫困地区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到两门农业实用技术，走上稳定的脱贫致富道路。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经济发展的攻坚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为解决占世界贫困人口 1/11 的中国贫困人口的生存权问题而做出的伟大贡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史无前例的壮举。

这一扶贫攻坚计划是十分艰巨的，其实现有相当的难度。首先，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 8000 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自然资源缺乏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库区、蓄滞洪区。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与 1985 年前后已经脱贫了的地区相比脱贫的难度要大得多。其次，今后每年脱贫的任务量要比过去高出将近一倍。在 1986—1992 年的七年间，全国农村每年脱贫人口约 642.8 万，而今后七年间每年脱贫人口为 1142.8 万，比过去多出 500 万人，难度相应增加。再次，实现温饱水平的一系列具体指标的达标都具有较大难度。例如 实现人均纯收入 500 元以上的指标 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平均每年必须净递增 7.57% 才行，比全国农村实现小康所要求的每年递增 5.8% 的速度高出近二个百分点。又如，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问题，1992 年以前的 22 年里 每年平均解决 681 万人和 409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而今后的七年里却要每年解决 1142 万人和 857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比过去平均每年任务量分别高出 68% 和 110% 难度确实很大。

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难度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实现‘计划’的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既有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面而周密的布署，又有贫困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既有东部地区和先富起来地区的大力帮

助，又有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的积极支持；既有过去不曾有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好机遇，又有国家和地方增幅较大的扶贫资金投入；既有开发与开放相结合的扶贫方针，又有国家给予的多项优惠政策；既有各级干部的扶贫责任制，又有社会各界定点扶贫的工作网络；既有国内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工作经验的指导，又有国际组织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援助。这些有利条件会铸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从可能变为现实。

总之，消除贫困的条件已经具备，下一步就看我们如何走了。为了保证“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现，为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存在，必须动员全社会的一切力量，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拧成一股绳，努力攻坚，持之以恒，方能奏效。我们相信，中国 8000 万贫困人口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张纯元

1994 年 11 月于北京大学

困境、希望与对策

定西县脱贫致富的人口对策研究

定西县是较为典型的贫困县，长期以来生产力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近年来农村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说，稳定脱贫、共同富裕的目标仍未彻底实现。通过对定西县各类问题长期的观察、分析与研究，我们认为除自然、历史、环境等原因外，现阶段影响定西县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因素之一乃是人口因素，因此定西县要发展经济，首先必须解决好人口问题，消除人口因素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对于定西县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按其本身属性及其影响作用的性质及表现，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人口的数量问题、质量问题、结构问题、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

(一) 人口数量问题

1. 基数过于庞大、总量相对过剩，导致人口密度过大、环境资源超载，生态严重恶化，可谓“人满为患”，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定西县自然、环境条件的特征所决定，其环境资源在目前科技、经济水平下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总量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日益严峻，突出表现为：

第一，人口密度过大。自建国至 1990 年期间，全县平均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 49.14 人逐步上升到 113 人，而根据国际有关组

织提供的研究结果，此类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所允许的人口密度以不超过每平方公里 20 人的水平为宜。相比较可知，目前定西县人口密度已超过该标准的四倍有余。

第二，人口总量对资源的压力日益加剧，资源超载严重。土地尤其耕地资源，是定西县农业生产的绝对基础资源。资料表明，1959—1990 年期间，全县总人口由 23.23 万人增至 41.22 万人，增长了 77.45%。耕地面积却由 211.87 万亩下降到 173.34 万亩，减少 18.19%，其间农村人均耕地数量下降更快，由 10.20 亩/人下降为 4.78 亩/人。据测算，自建国以来，人口总量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扩大了 2.25 倍，对耕地资源的压力则扩大约 2 倍。关于定西县土地人口承载力的运算结果表明，在当前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及中等投入条件之下，1990 年土地资源对人口数量的承载能力，温饱水平约为 30 万人，小康水平不超过 27 万人，科学营养水平以低于 22 万为宜；若以小康水平为标准，其容许的人口规模早在 1966 年就已达到，而 1990 年的实际规模则已超载 54%（约 14 万人）。从发展眼光看，至 2000 年全县土地人口承载能力所对应的小康水平约为 29 万人，届时的人口预测结果超过 45 万人，资源超载现象将更加严重。

第三，生态环境恶性循环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扼制。伴随着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及现有资源的日益缺乏，为维持生存的人类不断扩大自身的行为，以向环境索取所需。长期实践已证明了此类不当行为所导致的严重生态后果是植被破坏、林地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繁。据有关资料，定西县目前土壤侵蚀率高达 89.5%，土壤有机质含量年下降 1%，垦殖指数在干旱半干旱区名列前茅，气候稳定度也由解放前的 41.20%下降到目前的 14.80%。

2. 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新增人口太多，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的人口负担十分沉重，人口与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第一次生育高峰（1949—1957年）期间，定西县人口平均出生率约为36‰，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1974年）持续时间较长，出生率更高，平均达到42‰。人口增长十分迅速。随后计划生育的开展一度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局面，但进入80年代后期以来，生育水平又有回升，1989年全县总和生育率为2.54，仍居省内较高水平。

另据统计，1963—1990年期间，定西县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明显提高，如工业总产值增长53倍多，农业总产值增加6倍多，粮食总产量提高48%。但按人均计算，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不到30倍，人均农业总产值仅增加3倍，而人均产粮甚至减少了12%。各种经济指标的人均增长远低于总体增长速度。这说明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部分的将近一半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破坏了扩大积累的可能性（据测算，1990年定西县国民经济积累率不足20%，远低于全国40%的平均水平）使国民经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3. 早婚、早育率相对较高，二胎生育普遍，三胎及以上的多胎生育占有一定的比重。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定西县女性早婚、早育率分别达到5.95%和4.79%。胎次递进比为，96.73%的妇女生完二胎后又生了第三胎，90.32%的妇女生完三胎后又生了第四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也不容乐观，仅就1989年一年的生育情况看，全县92.00‰的生育率中，有19.28‰生育率是由三胎及以上引起的，多胎生育占21.46%。

（二）人口质量问题

1. 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文盲率高，各类人才缺乏，严重阻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发展，影响贫困的根除和致富的实现。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定西县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据计算目前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4.35年，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

不足小学水平 低于全省 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文盲、半文盲人口却较多,1990 年人口文盲率为 28.83%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3 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更高达 44.20% 同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 仅占在业人口的 3.72% 而在广大农村,各类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则更为缺少,平均百人中不足一人,农村科技队伍的力量相当薄弱。

人口文化素质如此低下,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极难进行,利用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据测算,80年代全县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平均速度仅为 1.2% 科技贡献率只有 12%左右 均不足全省水平之一半。由此所致,农业生产力水平难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赖以大量劳动力的数量投入勉强维持 农业经济缺乏发展的后劲。其次 这种文化素质现状 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活动的投入产出比率,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劳力和物质浪费,极大地阻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脱贫致富。另外,从人口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来看,这种文化素质水平对人口本身的健康发展亦具有不可忽视的不利影响。

2. 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实际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巨大差距,难以形成人口控制有效的内在机制。

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据调查 在农村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为生育目的之比例高达 90% 有 60%以上的农民追求三四个以上的子女;而近年农村早婚早育,多胎生育现象的抬头及生育水平的回升,有关研究已表明,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对劳动力的过分追求。总之,这种生育观念以追求劳动力数量的满足为核心 包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内容 表现出明显的传统、落后特征,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没有形成自觉控制的内在作用机制。

3. 缺乏主动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保守思想严重,商品经济

观念淡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严酷的自然条件、恶劣的生存环境 长期以来塑造出人们只知忍受而无所进取的思想观念，生产行为但求温饱，不思发展，致使容易满足、安于现状的思想倾向广泛流行。调查中有不少的家庭甚至贫困户对现状“非常满意”的一致回答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问题不止于此，值得注意之处还表现在消费方面。10余年的农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温饱问题初步解决，生活水平相对提高，随着贫困户的减少和富裕户的增多，农村在具有一定物质积累的条件下，在逐步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家庭消费却出现盲目、畸形的局面：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各类家庭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生产性支出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扩大的倾向，与现阶段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相矛盾。调查表明 农村家庭非基础性消费中 仅“人情送礼”一项就占近 1/4 的高比例——作为一种习俗 这一现象固然无可厚非 但若注意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竟低到不及其 1/10 的程度 尽管在这种投入下有 55% 的家长希望子女将来能受高等教育，75% 则希望子女至少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那么这种消费支出行为的不合理性、矛盾性所说明的，不仅仅是发展观念缺乏、保守思想严重这一显而易见的结论，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对于整体素质还不成熟、心理承受能力尚低、富裕之后不知怎么办的农村人口而言，贫困向富裕的过渡问题似乎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正如贫困并不仅指经济的贫困一样，富裕的本质，也绝非仅在于经济的富裕。可见，经济和物质的富裕，必然需要人们有与其相适应的思想素质，否则，与贫困问题一样，富裕亦可能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同时 农村社区环境封闭性强 人口流动率极低，1987—199.年三年中 户均交通费仅 21 元 有 1/5 的成年男性和 1/4 的成年女性连三天以上的外出活动都没有，就是在为数不多的外出活动中 竟有六成的男性、九成的女性外出仅为“走亲访友”务工经商的极少，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三）人口结构问题

定西县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

1. 人口产业结构模式落后。

1990年定西县在业人口按三次产业的分布构成约为 85:6:9 与全省 (81:9:10) 及全国 (72:15:13) 相比可见 在业人口第一产业分布过多 第二、三产业分布过少。即使在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内部 人口在业分布也极不平衡 农业占 99.24%的高比重，表明在业人口的产业分布模式相当落后。

2. 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

这是一个与人口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的问题。传统落后的人口产业结构模式，势必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较差不能有效地把握择业机会，于是就绝对集中于日益减少的有限耕地上，对耕地产生巨大的压力，对劳动就业也产生巨大的压力。劳动人口不能有效地与劳动对象相结合，既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又成为已经负重的定西社会经济的又一严重负担。估计 1990年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总量 含潜在剩余量 超过 5.2万人，占劳动总数的近 1/4。

3. 农业劳动人口的文化构成令人担忧。

劳动适龄人口的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村的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也影响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就业层次。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26.07万劳动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 1.16% 高中占 11.04% 初中占 24.92% 小学占 28.52% 文盲、半文盲却占 34.36% 整体文化水平不及小学毕业，不要说与先进地区比，和定西县平均文化水平相比，差距都是如此之大。这样低的文化构成，怎么能担负起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呢？

(四) 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

从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在任何历史阶段，人口(包括数量与质量)发展变动应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经济发展对于人口变动的客观要求，一是适当增长的人口数量，二是一

定水平的人口质量。而劳动力人口，作为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更是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从其间关系而言，经济发展依赖于适量规模的劳动力数量与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并以前者为前提，以后者为核心，最终通过后者来提高劳动效率，从而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前面对定西县人口问题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人口现状特征极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矛盾。人口的现状，在数量方面表现为基数庞大 增长迅速 劳动力数量过大 分布不合理且大量剩余；质量方面则表现为人口文化素质不高，文盲多，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消极思想普遍流行。无论总人口或劳动力人口，其数量与质量之间呈现极为矛盾的相悖关系：一方面是数量的绝对过剩，“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是质量的相对短缺，“供不应求”。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人口问题当中，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乃是焦点所在、关键所在、核心所在；它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人口数量的严重过剩，导致劳动力数量的严重过剩，使经济负担过重的人口压力，从根本上缺乏振兴的活力，经济的低速增长只能单纯依赖大量劳动力人口的不充分就业来实现，经济效率无法提高，严重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质量的低下水平，使科技无法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技术进步相对停滞甚至倒退，阻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文化贫困形成经济贫困的最终根源，构成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

总之 在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矛盾情形下 人口数量既不是经济发展意义下的“适量规模”，人口质量则更与发展经济所必需的“一定水平”差距较大，因而二者从根本上无法构成振兴经济前提条件。可以肯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之核心，即是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这一矛盾严重违背了人口与经济发

内在规律，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明显脱节。这一核心问题，导致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尖锐矛盾，它不但是产生贫困的最终根源，更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裹足不前、脱贫致富难以根本实现的本质原因。

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因素分析

(一) 方法

前面根据定西县实际情况，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各类人口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种种影响。当然，就某一特定的人口问题而言，它只可能对经济某一方面产生影响作用，或至少对经济某一方面具有与其它人口问题相比相对显著的独特作用。但若考虑下述问题，即在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之中，各类人口问题所致影响的差别如何，作用的强弱如何，或者说，经济过程中诸多人口问题之重点何在，众多人口因素的主导因子何在，则必须通过社会系统内各种关系的分析及引进适当的定量方法予以解决。通过理论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才能得出较为完善的答案，得到科学正确的结论，从而确定人口问题的重点、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并寻求积极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层次和多目标的复杂系统，其运动过程和运行机制中包含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大量的信息。这些关系和信息，除少量是我们所确知的或完全不确知的之外，其中大部分则介于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即呈现出“灰色”的特性，因此，人口—经济系统具有明显的灰色性质，是典型的灰色系统，这一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系统层次的复杂性、结构的模糊性、动态变化的随机性和指标数据的不确定性。

据此 在进行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作用的定量描述时 我们尝试采用灰色系统模型的基础方法之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选取某些经济指标作为目标变量，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类人口因素作为因素变量，利用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来描述两类变量间的内